



卖肾买高价手机 缺的不只是钱

□洪信良

一则题为《内地卖肾者调查》的报道让人读了惊愕莫名,报道中说,在地下肾脏交易市场中,尽管都是因为缺钱,但有些卖肾者的卖肾理由实在让人哭笑不得,比如有的是为了筹钱给女友打胎,有的卖肾是为了还2万元债,最雷人的是一个叫阿豪的19岁小伙子,他坚定不移地要卖肾,主要是为了买他每天都在念叨的iPad2和iPhone4s,并给QQ充一年的黄钻。(据3月27日《南方日报》)

看了这篇报道,相信很多人都忍不住想骂娘,也肯定忍不住在心中用“很”字造了很多句子,用了诸如“很黑”“很毒辣”“很嚣张”“很明目张胆”等词语来评价地下肾脏交易的横行无

忌,用了诸如“很脑残”“很懒惰”“很虚荣”“很可悲”等词语来评价阿豪这个小伙子与他的行为,而这也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先前觉得卖肾者“很穷”“很可怜”的旧印象。

没错,就阿豪这个案例而言,跟地下中介签下卖肾协议,而卖肾换取的2万元钱却只是为了购买一两件奢侈电子产品,真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,真可谓“爱疯”了。“爱疯”了也本无罪,你去找个活儿拼命工作,挣笔钱来实现奢华梦想,那说不定还能成为一个小小的励志故事呢,但怎么着也犯不着出卖自己的身体器官呀。

其实,去年就有媒体报道过类似的悲剧,安徽的高一学生小郑为买一台iPad2,赶到湖南郴州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脏,后来身体每况

愈下。在有些产品“饥饿营销”等刺激性手段的魅惑下,趋之若鹜的绝不只是有钱有闲一族,在“炫”风四起的时代,一些缺乏常识又缺乏自制力的青少年往往是最先中招的。

阿豪也好,小郑也好,在他们身上,我们可以读到家庭、学校、社会这三方教育的多种缺失。第一缺的是生命意识,第二缺的是医学常识,第三缺的是消费理性,第四缺的是勤俭品德,第五缺的是守法精神。

用自己的肾脏换一个一两年就要淘汰的手机,这都不是“值不值”的问题,放在任何时代、任何国家,都是可以编入“今古奇谈”之类书籍的怪事。而这样的事一再发生,整个社会在喊出一声“唉哟喂”的同时,真应该停下脚步,前后好好思量一番,看看忘带了什么。



文教评弹

刘路成功 谁尴尬?

□刘凤羽

最近一周,一个名叫刘路的22岁小伙子成为舆论争相关注的对象。

原因是,中南大学20日宣布,破格聘任该校在校硕士生刘路为正教授级研究员,他因此成为我国目前最年轻的正教授级研究员。

报道显示,刘路获此殊荣,源于他在上大三(2010年)时仅用两月时间就攻克国际数学难题“西塔潘猜想”。这一难题虽不能与“哥德巴赫猜想”等同日而语,但仍颇具分量,不少业界大家绞尽脑汁十数年都未破解。

虽然多年来中国20来岁的教授不乏其人,如上世纪北大的梁漱溟、叶公超、胡适、刘半农等,近年电子科技大学的周涛(27岁)、西南政法大学的施鹏鹏(28岁)等,但22岁就成为与教授“平级”的研究员,仍属罕见。或许正因如此,刘路成为正教授级研究员,一时招来不少“口水”:

支持者认为,中南大学不拘一格降人才,显示了校方魄力;反对者认为,此举有些“荒唐”;中立者认为,奖励和殊荣应到此为止,否则就成了捧杀,最终可能毁了一个数学天才。

客观地说,各方观点都有道理,只是角度不同而已。而真正的问题在于,在各方紧盯刘路被破格提拔的同时,似乎普遍忘了另一种视角,那就是刘路的成功并非来自学校教育、应试教育,相反,刘路某种程度上还反证了学校教育、应试教育的失败,这尤需深思。

查阅各方报道可发现,刘路算不上传统的好学生。他喜欢数学也有天赋,但中学数学成绩并不拔尖;高中期间成绩平平,高考惨淡,不少同学都进了清华、斯坦福、香港理工等名校,而他只进了中南大学;大学专业为应用数学,但专业成绩勉强算个中等。

在与应试教育有关、与他喜欢的数学有关的奥数领域,他同样“失败”:成绩并不拔尖,“顶多中偏上”,后来还因难度加大掉队并退出。

一个学习成绩平平的平凡学生,却偏偏超越那些学习成绩好、奥数拔尖并进入名校的同龄人,超越众多前辈高人,“一不小心”摘下了数学皇冠上一颗明珠,这让学校教育、应试教育情何以堪、何等尴尬?

各方报道显示,刘路成功,原因有几点:一是超越书本读书(初二自学数论,初三读完对初中生而言系“天书”的《古今数学思想集》,高中阅读全英文数学书籍,大学自学数理逻辑,自由探索,积累深厚。二是有创新能力,“西塔潘猜想”之所以多年无人破解,就是因为大家习惯用传统方式思考,而刘路换了一个角度进行反推就取得成功;而刘路的创新能力,知名数学家侯振挺也说“我都不如他”。三是独立思考,他会自己找问题、提问题,并长时间独立思考、钻研。

超越书本读书、自由探索、创新、独立思考,正是这些综合素质,才造就了一个数学天才。而这些综合素质,明显是当前学校教育、应试教育下学生所欠缺的,这也是中国教育的“死穴”。

由此联想到“钱学森之问”——“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”,答案似乎不言而喻。刘路的成功,值得全社会和中国教育界认真反思。

即便破解了世界难题,要说刘路就是杰出人才和大师,还有些夸张,但系数学天才、奇才,却毋庸置疑,未来不可限量,需要成长,更需要呵护。好在,校方开明地表示,不会用条条框框限制他,要给他长期的、自由的研究环境,“十年不考核他”。希望在大异当前考评制度的宽松环境下,刘路能够一如既往地自由探索、创新、独立思考、钻研,成为数学界的杰出人才。

现在最大的问题是,中国教育如何突破功利教育、应试教育的桎梏,让更多的刘路诞生,这一点才尤需关注。

你说我说

谁制造了早教的神话?

“起跑线”不可乱划

英洪波:每一位家长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,这也是早教如此盛行的源动力。家长不惜重金打造所谓的“黄金启蒙期”,就是想让孩子有一个强有力的起跑。但是,不管是家长自己还是那些所谓的“早教机构”,他们都没有资格给孩子划什么起跑线。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轨迹,他的起跑线在哪里,不是什么

“张老师”“李教授”说了算。要验证早教宣传的神奇效果得看数十年后了,谁等得起呢?

朱慧松:退一步讲,就算孩子小小年龄掌握了一些特长,就注定一辈子比别人强吗?人生是一场马拉松,不是刘翔跑110米栏,是否能成才取决于很多因素,先跑那几步算不了什么。

“大部分花都是被浇死的”

潜飞龙:《庄子》里边有个故事:惠子和庄子比谁种的葫芦大。惠子非常用心,每天都给葫芦施肥除草,没过多久惠子的葫芦一棵一棵相继死去,最后一棵也没有成活。而庄子呢,他从不施肥除草,只是到时候去看看,见没有什么异常,就管自己做别的事去了。结果庄子的葫芦苗长得格外好,慢慢地葫芦开花结果了,而且长出了很大的葫芦。惠子百思不得其解。庄子说,他也是在用心管理的,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。“您没见到

时候要去地里转转吗?我是去看看葫芦苗在地里是不是快乐,如果它们都很快乐,我当然就不用去管它们。而您却不管它们的感受,拼命地施肥,哪有不死之理啊?”

无独有偶,平素喜欢花花草草的我,刚开始养花时老把花养死。后来,我去请教专门种花的师傅,他说:“大部分花都是被浇死的,花要透了浇透,要知道花的习性。”我恍然大悟。种葫芦养花是如此,培养孩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
谁来监管早教培训机构

孙维国:有需求就有市场。早教市场的火爆也折射了家长的焦虑和功利。因为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乃至大学,我们的教育评价体系僵化而单一,分数至上是衡量一个学生的核心标准。没有分数上不了好小学、好初中、好高中、好大学,与此对应的逻辑是,上不了好大学就难以找到一份好工作(拼爹除外),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对生活甚至一生都会产生影响。这就是现实,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现实,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倒逼下,家长才有了“望子成龙”、“望女成凤”的焦虑和“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”的功利。可以说,正是“分数至上”才催生了早教市场的火爆,加之缺失有效监

管和制度约束,导致早教市场乱象丛生。

王军荣:让孩子接受“早教”,其实也无可指责,早教也是有科学依据的。问题的症结其实不在于早教,而在于“伪早教”。现在的早教市场良莠难辨,不少早教机构赚的是“眼球经济”,能够用什么吸引家长?恐怕就是些“伪科学”,借助的就是外国的理论,说得越玄乎越能吸引家长。“伪早教”之下,孩子还能健康成长吗?

别一味指责家长的浮躁心理,早教没有原罪,有罪的是一片乱象,是“伪早教”,别让家长既花了钱,又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。这需要监管部门出手,要知道早教乱象已经是根深蒂固了,不能再拖沓了。



当前,不管是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一线城市,还是在嘉兴等二三线城市,早教市场都异常火爆,市场份额已经达到千亿元规模。一位知情者向记者透露,现在的早教培训机构用那些零散的没有被科学论证的舶来数据,让大量望子成龙心切的年轻父母动辄几千上万地花大钱。(详见本报今日11版)

“灾爷”是怎么炼成的?

□曾颖

竹篱窰井盖、“纸壳”单元门,出现在江西省最大的地震灾民安置小区瑞昌市瑞民家园内。2005年11月26日,江西九江地区发生5.7级地震,瑞昌市因位于震中附近,倒房1000间,损房10万余间。2006年,瑞昌市政府提出“决战50天,确保全市灾民重建户按时入住新居”。在紧迫要求之下,本应10个月的工期被缩短至6个月。该小区自投入使用起,6年来,一直投诉不断。对于灾民的不断投诉和维权之举,一位建设局官员评价时称:“他们不是灾民,而是灾爷。”(据3月26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在这条新闻中,有无数令人心惊的“雷”点——用近乎于拍电影建造工房的方式来建设的安置房;连超级幻想家都不敢用的竹篱窰井盖和“纸壳”门;还有建设局官员吼出的那声“灾爷”,都足以让人心惊。

从字面上看,“灾爷”这个称呼,是指灾民们将自己当成爷,有暗指灾民难伺候、难缠,甚至要求过高,不体谅政府苦衷之类的意思。事实上,在遭遇突发灾难时,灾区群众在恐怖灾难面前短暂地表现出惊慌、恐惧甚至提出不可理喻的要求的可能性是有的,这种情况可能短时出现在受灾初期,但绝对不是一种常态。

当救灾措施跟不上,群众的信心得到激励和鼓舞的时候,多数人是感恩并体谅政府的。在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工作中,这种规律非常明显。很少有灾民以“爷”自居,干出各种出格的事情来。

瑞昌市的灾民们要的,只是在保证基本安全前提下能正常居住的房子。这样的要求高吗?但即便这样的基本要求,也并没有得到满足,这“爷”是不是也当得太窝囊了一点?

事实是,在救灾安置中,瑞昌市灾民的需求和愿望,并没有排在第一位。试想,如果他们真把灾民当成“爷”,会如此轻率地减短工期,调整用料,降低验收标准,造出投诉率如此高的房子吗?这已不是坑爹,简直是坑爷了!